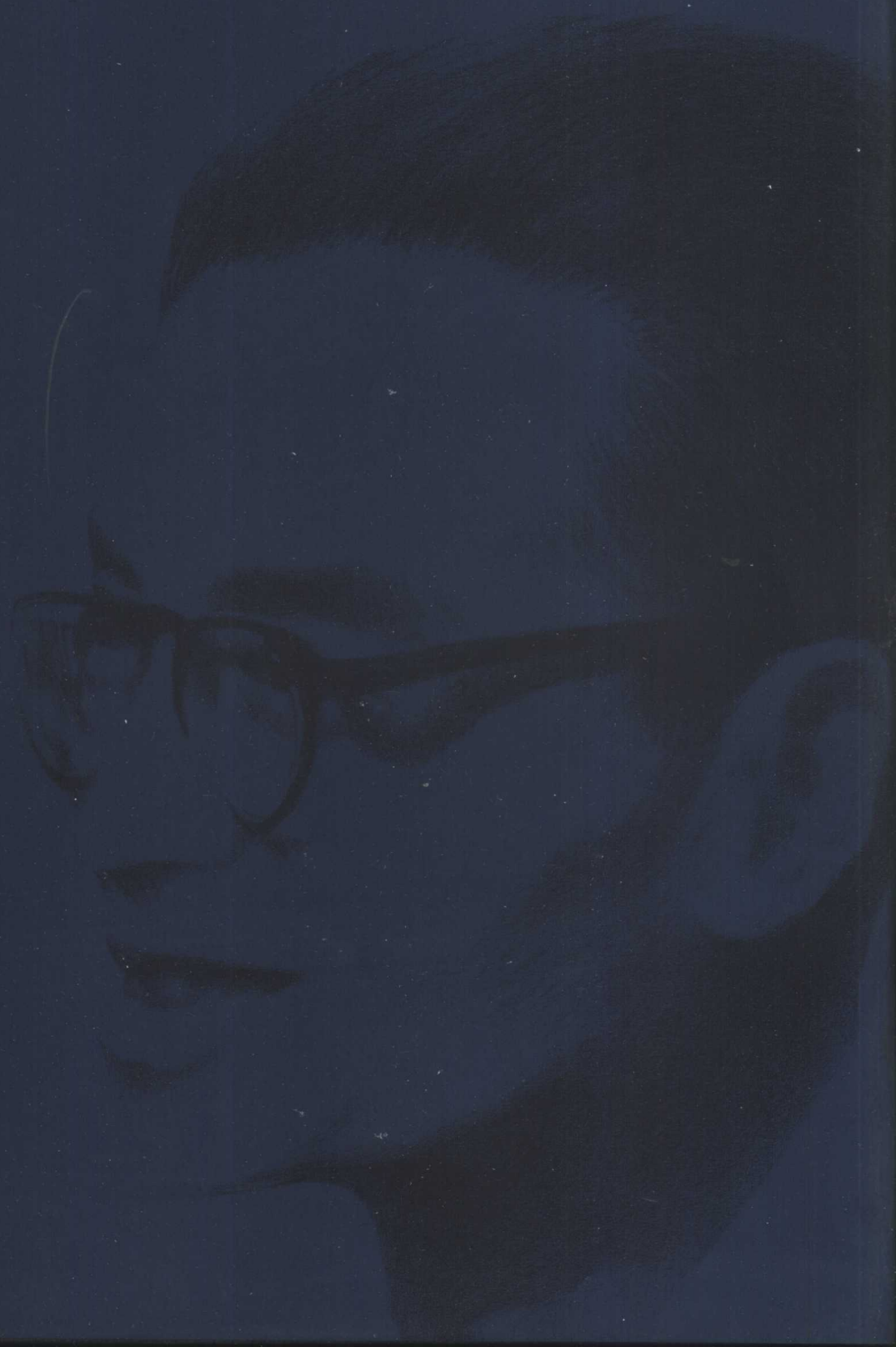


梁思成全集

【第八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TU-52

1

:8

梁思成全集



第八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思成全集. 第八卷 / 梁思成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4

ISBN 7-112-04432-4

I. 梁... II. 梁... III. ①梁思成一全集②建筑学—文集 IV. TU-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067 号

责任编辑: 刘爱灵

总体设计: 冯彝诤

梁思成全集 第八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广厦京港图文有限公司设计制作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7 1/2 字数: 608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10.00 元

ISBN 7-112-04432-4

N · 17(99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图像中国建筑史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关于中国建筑结构体系的发展及其形制演变的研究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Types

梁思成 英文原著

by Liang Ssu-ch'eng

费慰梅 编 Edited by Wilma Fairbank

梁从诫 译 Translated by Liang Congjie

孙增蕃 校 Translation checked by Sun Zengfan

梁思成

纪念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经过他们在1931年至1946年那些多灾多难的岁月中坚持不懈的努力，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中国古建筑遗构，并开创了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事业。

To the memory of Liang Ssu-ch'eng, Lin Whei-yin, and their coworkers at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whose perseverance through times of disaster from 1931 to 1946 discovered a sequence of surviving Chinese monumental structures and pioneere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目 录

1

致谢

3

序

4

梁思成传略

11

英文版编辑方法

13

地图——本书所提到的重要建筑物所在地

15

译叙

17

前言

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

21

起源

27

两部文法书

目 录

佛教传入以前和石窟中所见的木构架建筑之佐证

37

间接资料中的佐证

39

汉代的佐证

46

石窟中的佐证

木构建筑重要遗例

53

木构建筑重要遗例

57

豪劲时期(约公元 850 ~ 1050 年)

84

醇和时期(约公元 1000 ~ 1400 年)

114

羁直时期(约公元 1400 ~ 1912 年)

佛塔

135

佛塔

目 录

136

古拙时期(约公元 500 ~ 900 年)

151

繁丽时期(约公元 1000 ~ 1300 年)

161

杂变时期(约公元 1280 ~ 1912 年)

其它砖石建筑

173

陵墓

176

券顶建筑

178

桥

184

台

186

牌楼

目 录

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192

Contents

255

Chinese Dynasties and Periods Cited in the Text

中国朝代和各时期与公元年代对照表

256

Glossary of Technical Terms

技术术语一览

259

Guide to Pronunciation

汉字拼音法指南

260

Selected Bibliography

部分参考书目

264

Index

索引

致 谢

为了使梁思成的这部丢失了多年的著作能够如他生前所期望的那样奉献给西方读者，许多钦慕他和中国建筑的人曾共同作出过努力。其中，首先应归功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教授。1980年，是他委托我来编辑此书并设法在美国出版。我非常高兴能重新承担起33年前梁思成本人曾托付给我的这个任务。

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出版社，向以刊行高质量的建筑书籍而负盛名，蒙他们同意出版本书，使这个项目得以着手进行。然而，海天相隔，怎样编好这么一部复杂的书，却是一大难题。幸运的是，我们得到了梁思成后妻林洙女士的竭诚合作。她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员，对她丈夫的工作非常有认识并深情地怀念着他。我同她于1979年在北京相识，随后，在1980和1982两年中又在那里一道工作。她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三年中和我一起不厌其烦地做了许多诸如插图的核对、标码、标题、补缺之类的细致工作，并解答了我无数的问题。我们航信频繁，她写中文，我写英文，几年中未曾间断。这里，我首先要对这位亲爱的朋友表示我的感激。

1980年夏，本书的图稿与文稿在北京得以重新合璧。此后，我曾二访北京。这些资料奇迹般地失而复得，为我敞开了回到老朋友那里去的大门。我的老友，梁思成的妹妹梁思庄，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和他的全家，还有他们的世交金岳霖都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我还有幸拜访了三位老一代的建筑师，后来又和他们通信。他们是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时代的同窗，又是他的至交，即现在已经故去的杨廷宝和童雋，还有陈植。在30年代曾参加过中国营造学社实地调查的较年轻的建筑史学家中，我曾见到了莫宗江、陈明达、罗哲文、王世襄和刘敦桢的儿子和学生刘叙杰。战争时期，当营造学社避难到云南、四川这些西南省份的时候，他们都在那里。还有一些更晚一辈的人，即战后50年代以来梁思成在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在本书付印前的最后阶段曾给了我特殊的帮助，特别是奚树祥、殷一和、傅熹年和他在北京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的同事孙增蕃等几位。本书书末的词汇表主要依靠他们四位的帮助；傅熹年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照片；奚树祥为编者注释绘制了示意图并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伦敦的安东尼·兰伯特爵士和蒂姆·罗克在重新寻得的这批丢失了的图片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爱尔瑟·格兰曾对我有过重要影响。她是欧洲首屈一指的中国建筑专家，也是一位钦慕梁思成的著作的人。她曾同我一道为促使本书出版而努力。我在开始编辑本书之前，就曾从她那里受到过很多的教益。

在美国，我曾得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档案室的慷慨帮助。在普林斯顿大学，罗伯特·索普和梁思成过去的学生黄芸生曾给了我指导和鼓励。我在耶鲁大学的朋友乔纳森·斯彭斯，玛丽斯·赖特，玛丽·加德纳·尼尔以及建筑师邬劲旅始终支持我的工作，特别是后者介绍给我海伦·奇尔曼女士，她是梁思成1947年在耶鲁大学讲学时所用的中国建筑照片的幻灯复制片的保管者。哈佛大学是我的根据地，我经常利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和福格艺术博物馆，我应向前者的主任吴允金(译音)和后来的代理主任约翰·罗森菲尔德致以特别的谢意。日本建筑史专家威廉·科尔

德雷克对我总是有求必应。这里的建筑学家们也都乐于帮助我，特别是孙保罗(译音)和戴维·汉德林两位，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本书的积极鼓吹者，而罗宾·布莱索则为我编辑工作又作了校阅和加工。我的朋友琼·希尔两次为我打印誉清。我的妹妹海伦·坎农·邦德曾给予我亲切的鼓励和许多实际帮助。

美国哲学会和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资助了我的研究工作和旅行。我的北京之行不仅富于成果，而且充满乐趣，这主要应归功于加拿大驻华使馆的阿瑟·孟席斯夫妇和约翰·希金波特姆夫妇对我的热情招待。

我的丈夫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一直呆在家里，这是他唯一可以摆脱一下那个斗拱世界的地方，在我编辑此书的日子里，这个斗拱世界搅得我们全家不得安生。像往常一样，他那默默的信赖和当我需要时给予我的内行的帮助总使我感激不尽。

费慰梅 (Wilma Fairbank)

序^①

杰出的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是中国古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这部著作〔系用英文〕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他刚刚完成了在华北和内地的实地调查。梁思成教授本来计划将此书作为他的《中国艺术史》这部巨著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中国雕塑史，他已写好了大纲。但这个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现在的这部书，是他早年研究工作的一个可贵的简要总结，它可使读者对中国古建筑的伟大宝库有一个直观的概览；并通过比较的方法，了解其“有机”结构体系及其形制的演变，以及建筑的各种组成部分的发展。对于中国建筑史的初学者来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入门教材，而对于专家来说，这部书也同样有启发意义。在研究中，梁思成从不满足于已有的理解，并善于深入浅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由梁思成和莫宗江教授所亲手绘制的这些精美插图，将使读者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

梁思成终身从事建筑事业，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他不仅留给我们大量以中文写成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几年内将在北京出版或重刊），而且他还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有影响的教育家。他曾经创建过两个建筑系——1928年辽宁省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和1946年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后者至今仍在蓬勃发展。他桃李满天下，在中国许多领域里都有他的学生在工作。1949年以后，梁思成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后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被任命为负责人之一。此外，他还为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促进全国文物保护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逝世至今虽然已经十多年，但人们仍然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纪念着他。

这部书终于得以按照作者生前的愿望在西方出版，应当归功于梁思成的老朋友费慰梅（Wilma Fairbank）女士。是她，在梁思成去世之后，帮助我们追回了这些已经丢失了二十多年的珍贵图版，并仔细地将文稿和大量的图稿编辑在一起，使这部书能够以现在这样的形式问世。

吴良镛

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① 这篇序是吴良镛教授应费慰梅之请，为1984年在美国出版的本书英文原作而写的——梁从诫注。

梁思成传略



1935年考察古建筑时的梁思成[1935年测绘河北正定隆兴寺时留影]

Liang Ssu-ch'eng at work, around 1935

长久以来，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传统建筑总因其富于异国情趣而令人神往。那些佛塔庙宇中的翼展屋顶，宫殿宅第中的格子窗棂、庭园里的月门和拱桥，无不使18世纪初的欧洲设计家们为之倾倒，以致创造了一种专门模仿中国装饰的艺术风格，即所谓Chinoiserie。他们在壁纸的花纹、瓷器的彩绘、家具的装饰上，到处模仿中国建筑的图案，还在阔人住宅的庭院里修了许多显然是仿中国式样的东西。这种上流阶层的时尚1763年在英国可谓登峰造极，竟在那里的“克欧花园”中建起了一座中国塔；而且此风始终不衰。

在中国，工匠们千百年来发展出这些建筑特征，则是为了适应人们的日常之需，从蔽风遮雨直到奉侍神明或宣示帝王之威。奇怪的是，建筑却始终被鄙薄为匠作之事而引起知识界的兴趣去对它作学术研究。直到20世纪，中国人才开始从事于本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而其先驱者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年)的家学和教育，注定使他成为充当中国第一代建筑史学家领导者的最适合人选。他是著名的学者和改革家梁启超的长子。他热爱父亲并深受其影响。将父亲关于中国的伟大传统及其前程的教诲铭记在心。他的身材不高，却有着缜于观察，长于探索，细致认真和审美敏锐的天资，喜爱绘画并工音律。虽是在父亲被迫流亡日本时出生于东京，他却在北京长大。在这里，他受到了两个方面的早期教育，后来的事实表明，它们对于他未来的成就是极其重要的。首先，是在他父亲指导下的传统教育，也就是对于中国古文的修养，这对于日后他研读古代文献，辨识碑刻铭文等等都是不可少的；其次，是在清华学校中学到的扎实的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这些课程是专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开设的。他和他的同学们都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那杰出的一代，具有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深厚修养，而能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成绩卓著。

梁思成以建筑为其终身事业也有其偶然原因。这个选择是一位后来同他结为夫妻的姑娘向他建议的。这位姑娘名叫林徽因，是学者、外交家和名诗人林长民之女。1920年〔此处英文原文有误〕，林长民奉派赴英，年甫16岁的林徽因被携同行，她非常聪颖、敏捷和美丽。当时就已显示出对人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后来成了她一生的特色。她继承了自己父亲的诗才，但同样爱好其他艺术，特别是戏剧和绘画。她考入了一所英国女子

中学，迅速地增长了英语知识，在会话和写作方面达到了非常流利的程度。从一个以设计房子为游戏的英国同学那里，她获知了建筑师这种职业。这种将日常艺术创造与直接实用价值融为一体工作深深地吸引了她，认定这正是她自己所想要从事的职业。回国以后，她很快就使梁思成也下了同样的决心。

他们决定同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这个系的领导者是著名的保罗·克雷特，一位出身于巴黎美术学院的建筑家。梁思成的入学由于1923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摩托车车祸中左腿骨折而被推迟到1924年秋季。这条伤腿后来始终没有完全复原，以致落下了左腿略跛的残疾。年轻时，梁思成健壮、好动，这个残疾对他损害不大；但是后来它却影响了他的脊椎，常使他疼痛难忍。

宾大的课程继承了巴黎美术学院的传统，旨在培养开业建筑师，但同样适合于培养建筑史学家。它要求学生钻研希腊、罗马的古典建筑柱式以及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系里常以绘制古代遗址的复原图或为某未完成的大教堂作设计图为题，举行作业评比，以测验学生的能力。对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是绘制整洁、美观的建筑渲染图，包括书写。梁思成在这方面成绩突出。在他回国以后，对自己的年轻助手和学生也提出了同样高标准的要求。

梁思成在宾大二年级时，父亲从北京寄来的一本书决定了他后来一生的道路。这是1103年由宋朝一位有才华的官员辑成的一部宋代建筑指南——《营造法式》，其中使用了生僻的宋代建筑术语。这部书已失传了数百年，直到不久前它的一个抄本才被发现并重印。梁思成立即着手研读它，然而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却大半没有读懂。在此之前，他很少想到中国建筑史的问题，但从此以后，他便下了决心，非把这部难解的重要著作弄明白不可。

林徽因也在1924年的秋季来到了宾大，却发现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好进入该校的美术学院，设法选修建筑系的课程。事实上，1926年她就被聘为“建筑设计课兼任助教”，次年又被提升为“兼任讲师”。1927年6月，在同一个毕业典礼上，她以优异成绩获得美术学士学位，而梁思成也以类似的荣誉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

在费城克雷特的建筑事务所里一同工作了一个暑假之后，他们两人暂时分手，分别到不同的学校深造。由于一直对戏剧感兴趣，林徽因来到耶鲁大学乔治·贝克著名的工作室里学习舞台设计；梁思成则转入哈佛大学，以研究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艺术和建筑的著作。

就在这一时期，正当梁思成二十多岁的时候，第一批专谈中国建筑的比较严肃的著作在西方问世了。1923年和1925年，德国人厄恩斯特·伯希曼出版了两卷中国各种类型建筑的照片集。1924年和1926年，瑞士一位艺术史专家喜龙仁发表了两篇研究北京的城墙、城门以及宫殿建筑的论文。多年以后，作为事后的评论，梁思成曾经指出：“他们都不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对于中国建筑的描述都是一知半解。在两人之中，喜龙仁较好。他尽管粗心大意，但还是利用了新发现的《营造法式》一书。”

由于梁思成的父亲坚持要他们完成学业后再结婚，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礼直到1928

年3月才在渥太华举行,当时梁思成的姊夫任当地中国总领事。他们回国途中,绕道欧洲作了一次考察旅行,在小汽车里走马看花地把当年学过的建筑物都浏览了一遍,游踪遍及英、法、西、意、瑞士和德国等地。这是他们第一次一同进行对建筑的实地考察,而在后来的年月里,这种考察旅行他们曾进行过多次。同年仲夏他们突然获知国内已为梁思成找到了工作,要求他立即到职。而直到此时,他们才得知梁思成的父亲病重,不久,梁父便于1929年1月过早地去世了。

1928年9月,梁思成应聘筹建并主持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在妻子和另外两位宾大毕业的中国建筑师的协助下,他建立了一套克雷特式的课程和一个建筑事务所。中国的东北地区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广袤土地,资源丰富。若不是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在这里进行建筑设计和施工本来是大有可为的。这几位青年建筑师很快就为教学工作、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施工监督而忙得不亦乐乎。然而,1931年9月,仅在梁思成到校三年之后,日本人就通过一次突然袭击攫取了东北三省。这是日本对华侵略的第一阶段。这种侵略此后又延续了14年,而从1937年起爆发为武装冲突。

这个多事之秋却标志着梁思成在事业上的一次决定性的转折。当年6月,他接受了一个新职务,这使他后来把自己精力最旺盛的年华都献给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事业。1929年,一位有钱的退休官员朱启铃由于发现了《营造法式》这部书而在北京建立了一个学会,名叫中国营造学会(以后改称中国营造学社)。在他的推动下这部书被发现和重印,曾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为了解开书中之谜,他曾罗致了一小批老学究来研究它。但是这些人和他自己都根本不懂建筑。所以,朱启铃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动员梁思成参加这个学社并领导其研究活动。

学社的办公室就设在天安门内西侧的一个庭院里。1931年秋天,梁思成在这里又重新开始了他早先对这部宋代建筑手册的研究。这项工作看来前途广阔,但他对其中大多数的技术名词仍然迷惑不解。然而,过去所受实际训练和实践经验使他深信,要想把它们弄清楚,“唯一可靠的知识来源就是建筑物本身,而唯一可求的教师就是那些匠师”。他想出这样一个主意,即拜几位在宫里干了一辈子修缮工作的老木匠为师,从考察他周围的宫殿建筑构造开始研究。这里多数的宫室都建于清代(1644~1912年)。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曾颁布过一部清代建筑规程手册——《工程做法则例》,其中也同样充满了生僻难懂的术语。但是老匠师们谙于口述那些传统的术语。在他们的指点下,梁思成学会了如何识别各种木料和构件,如何看懂那些复杂的构筑方法,以及如何解释则例中的种种规定。经过这种第一手的研究,他写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清式营造则例》。这是一部探讨和解释这本清代手册的书(虽然在他看来,这部则例不能同1103年刊行的那本宋代《营造法式》相比)。

梁思成就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初步揭开了他所谓的“中国建筑的文法”的奥秘。但这时他仍旧读不懂《营造法式》和其中那些11世纪的建筑资料,这对他是一个挑战。然而,根据经验,他深信关键仍在于寻找并考察那个时代的建筑遗例。进行大范围的实地调查已

提到日程上来了。

梁氏夫妇的欧洲蜜月之行也是某种实地考察,是为了亲眼看一看那些他们已在宾大从书本上学到过的著名建筑实物。在北京同匠师们一起钻研清代建筑的经验,也是一次类似的取得第一手资料的实地考察,无非是没有外出旅行而已。显然,要想进一步了解中国建筑的文法及其演变,只能靠搜集一批年份可考而尽可能保持原状的早期建筑遗构。

梁氏注重实地调查的看法得到了学社的认可。1931年,他被任命为法式部主任。次年,另一位新来的成员刘敦桢被任命为文献部主任。后者年龄稍长于梁思成,曾在日本学习建筑学,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学者。在此后的10年中,他们两人和衷共济,共同领导了一批较年轻的同事。当然,两人都是既从事实地调查,也进行文献研究,因为两者本来就密不可分。

尚存的清代以前的建筑到哪里去找呢?相对地说,在大城市里,它们已为数不多。许多早已毁于火灾战乱,其余则受到宗教上或政治上的敌人的故意破坏。这样,调查便须深入乡间小城镇和荒山野寺。在作这种考察之前,梁氏夫妇总要先根据地方志,在地图上选定自己的路线。这种地方性的史志总要将本地引以为荣的寺庙、佛塔、名胜古迹加以记载。然而,其年代却未必可靠,还有一些读来似颇有价值,但经长途跋涉来到实地一看,却发现早已面目全非,甚至湮灭无寻了。尽管如此,依靠这些地方志的指引,仍可以在广大地区中,直至全省范围内进行调查,而不致有重要的遗构被漏掉。当然,也有某些发现是根据人们的传说、口头指引,乃致历来民谣中所称颂的渺茫的古建筑而得到的。在30年代,中国建筑史还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在这里一些空前的发现常使人惊喜异常。

那个时代,外出调查会遇到严重的困难。旅行若以火车开始,则往往继之以颠簸拥挤的长途汽车,而以两轮硬板骡车告终。宝贵的器材——照相机、三角架、皮尺、各种随身细软,包括少不了的笔记本,都得带上。只能在古庙或路旁小店中投宿,虱子成堆、茅厕里爬满了蛆虫。村边茶馆中常有美味的小吃,但是那碗筷和生冷食品的卫生却十分可疑。在华北的某些地区还要提防土匪对无备的旅客作突然袭击。

只要林徽因能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安排妥当,梁氏夫妇总是结伴同行,陪同他们的常是梁思成培养的一位年轻同事莫宗江,此外就是一个捎行李和跑腿的仆人。他们去的那种地方电话是很罕见的,地方衙门为了和在别处的上司联系,可能有一部;小城里也就再没有其他线路了。这样,在对于某个重大发现能够进行详尽考察之前,往往要花费许多时间去找地方官员、佛教高僧和其他人联系、交涉。

当所有这些障碍都终于被克服了之后,这支小小的队伍便可以着手工作了。他们拉开皮尺,丈量着建筑的大小构件以及周围环境。这些数字和画在笔记本上的草图对于日后绘制平面、立面和断面图是必不可少的,间或还要利用它们来制作主体模型。同时,梁思成除了拍摄全景照片之外,还要背着他的莱卡相机攀上梁架去拍摄那些重要的细部。为了测量和拍照,常要搭起临时脚手架,惊动无数蝙蝠,扬起千年尘埃。寺庙的院里或廊下常常立着石碑,上面记着建造或重修寺庙的经过和年代,多半是由林徽因煞费苦心地去抄录下

来。所有这些宝贵资料都被记在笔记本上，以便带回北京整理、发表。

1932年，梁思成的首次实地调查就获得了他的最大成果之一。这就是坐落在北京以东60英里〔约100公里〕处的独乐寺观音阁，阁中有一尊55英尺〔约16米〕高的塑像。这座建于984年的木构建筑及其中塑像已历时近千年而无恙。

1941年，梁思成曾在一份没有发表的文稿中简述了30年代他们的那些艰苦的考察活动：

过去九年，我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每年两次派出由研究员率领的实地调查小组，遍访各地以搜寻古建遗构，每次二至三个月不等。其最终目标，是为了编写一部中国建筑史。这一课题，向为学者们所未及，可资利用的文献甚少，只能求诸实例。

迄今，我们已踏勘15省200余县，考察过的建筑物已逾两千。作为法式部主任，我曾对其中的大多数亲自探访。目前，虽然距我们的目标尚远，但所获资料却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对于梁、林两人来说，这种考察活动的一个高潮，是1937年6月间佛光寺的发现。这座建于公元857年的美丽建筑，坐落在晋北深山之中，千余年来完好无损，经过梁氏考察，鉴定为当时中国所见最早的木构建筑，是第一座被发现的唐代原构实例。他在本书69至70页关于这座建筑的叙述，虽然简略，却已表达出他对于这座“头等国宝”的特殊珍爱。

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一个值得称道的特色，是迅速而认真地将他们在古建调查中的发现，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季刊)上发表。这些以中文写成的文章对这些建筑都作了详尽的记述，并附以大量图版、照片。《汇刊》还有英文目录，可惜当时所出七卷如今已成珍本。

本书是梁思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四川省李庄这个偏远的江村中写成的。1937年夏，在北京沦陷前夕，梁氏一家和学社的部分成员撤离了北京。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当时尚在中国政府控制下的西南山区省份避难。此时，学社已成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①，接受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补助经费，由梁思成负责。他们对四川和云南的古建筑也作了一些调查。然而，在八年抗战中，封锁和恶性通货膨胀，使他们贫病交加。刘敦桢离开了学社，去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年轻人也纷纷各奔前程。但梁思成和他的家人仍留在李庄，追随他们的，只有他忠实的助手莫宗江和其他少数几人。林徽因患肺结核病而卧床不起。就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梁思成在妻子始终如一的帮助之下完成了他们这本唯一的英文著作，目的在于向国外介绍过去十五年来中国营造学社所获得的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与世隔绝饱经忧患的情况下解脱出来的梁思成于1946年受到了普林斯顿和耶鲁两所大学的热情邀请，赴美就中国建筑讲学。他的中文著作早已为西方所知，此时他已成为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他把全家安顿在北京，于1947年春季作为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到了美国。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美国。

到此为止，我的叙述没有涉及个人关系。这是为了说明梁思成、林徽因作为学科带头人的重要作用，而避免干扰。但是，以上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作为梁氏的亲密朋友

^① 原文不确。当时营造学社只是接受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补助经费，为其收集、编制古代建筑资料——孙增蕃校注。